

作者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曾任该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这本《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他出版了多部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著作和文章，如《The Nationalist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1990) 和《Beyond State Crisis? Postcolonial Africa and



【译 文】

# 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sup>1</sup>

##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第一章

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著，马忠才译<sup>2</sup>

“……我们长途跋涉，到异国他乡去揭示那些同样存在于国内却已不被察觉的事像和真理。”

米歇尔·德·塞尔多 (Michel de Certeau)

《日常生活的实践》

1991年5月18日，两名苏联宇航员从拜科努尔卫星发射基地点火升空，登陆到米尔空间站执行一项历时四个月的例行任务。宇航员在失重的太空中作业，而与此同时，地球上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土崩瓦解，若干个新的共同体应运而生。当他们返回地球，并不知道派遣他们的国家是否依然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及其乘坐的飞行器应当属于哪一个国家。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故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终结了东欧半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霸权，打破了地球上的冷战格局，促发了21世纪将长期存在的新的对抗与冲突。不过，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挑战现有政治理念的悖论。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曾是一个具有74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幸存者。历史上，苏联曾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数次致使百万人丧生的饥荒、统治者针对国内公民的大屠杀，而社会革命最终将其带入工业社会。这个国家是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度，它建立的政治理念曾令无数世人欢欣鼓舞，并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视为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1988至1991年期间联盟的分崩离析，却主要源自于它自身的族群 (ethnic) 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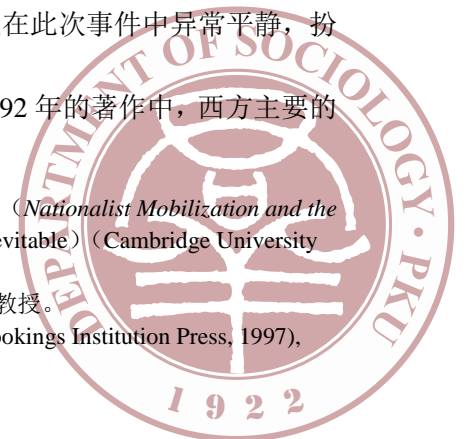
苏联解体也是现代历史发展中最出人意料的事件。如果在1987年对西方学者做一个民意测验，相信大家肯定会一致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是“不太可能的”。豪克 (Jerry Hough) 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事件的发生如此突然而出乎预料，以至于没有人有时间回顾曾经发生了什么。观察家们，即使在其观点被历史事实证伪的时候，依然倾向于坚持他们对事件解释的见解，并在矛盾和互斥中将其综合进后续事件的阐释之中。”<sup>3</sup> 1988年之前，几乎没有学者料到苏联将会分裂，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其民族 (nationality) 问题的判断出现了偏误，他们曾以为苏联假如分裂，只会源于中亚穆斯林的反抗或起义。<sup>1</sup> 但事实上，中亚在此次事件中异常平静，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

西方民族学者对此同样无所作为。在一本写于1990年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中，西方主要的

<sup>1</sup> 本文为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著《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的第一章 (Chapter 1, 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Inevitab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第1-46页。

<sup>2</sup>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生，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俗学院副教授。

<sup>3</sup> Jerry F.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3.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和族群 (ethnicity) 理论专家被要求以比较研究的视野分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正在发生的变迁, 而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一个作者预测到即将发生的分裂事件, 却有不少人公开批驳苏联即将终结的观点。<sup>2</sup> 尽管针对苏联研究者研究能力的谴责是有理由的, 但我们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应给予理解: 因为即使是苏联自己的大部分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在 1987 年都无法想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即将崩溃<sup>3</sup>。在 1990 年之前, 国家解体这种可能性一直处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识之外, 而且没有什么人去关心族群 (ethnic) 问题。

本书是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历史浓缩时期内 (a compressed period of history), 分析这个看来似乎“不可能”的 (解体) 是如何转变为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可避免”, 一个曾被认为无需多虑、不可改变的价值世界, 是如何被颠倒过来。吊诡的是, 尽管极少有人在事发前的数年中预料过这种可能性, 但今天的主流观点却声称“苏联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 在事发之前, 苏联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趋势中并没有显现出将要解体的任何征兆。通常认为,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必然**的结构决定论是一种**目的论**, 柏林 (Isaiah Berlin) 将其核心理念归纳为: 历史具有可经社会运动证实的内在的逻辑和本质, 超越个人意志。柏林批判道, 目的论使历史中的社会行动的角色变得无足轻重, 其目的是解释历史结果不可避免, 并强调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柏林所言, 在目的论的归因中, “我们苦于处理的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论, 而是一个形而上的态度问题, 即想当然地解释一个事件……凭主观推断, ……作为宿命论的目的论既不会被任何经验证伪, 也不能被证实。疑证 (evidence)、确证 (proof), 可能性等对它都是不适用的”。<sup>5</sup>

在学术界和民间, 关于苏联解体的目的论阐释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作者, 如玛丽亚 (Martin Malia), 宣称苏联解体是列宁主义固有的逻辑, 因为极权主义的本质即铸就了它自身的不可变革性。玛丽亚提出这个观点: “共产主义固有的不可变革性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它已成为历史事实。”<sup>6</sup> 玛丽亚对苏联解体的阐释, 指其并非一种可能性 (probability), 而是一种必然性。可是, 如果我们假定她的解释是对的, 即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为什么事发之前有那么多人相信苏维埃联盟牢不可破? 在苏联“公开化”政策实施的前夕, 人们普遍相信苏联体制已经获得了公民普遍认可的正统性, 已经排除了列宁主义中曾出现过的**民族语境** (national context), 而且制度的说服力运行已取代了武力强制。<sup>7</sup> 尽管苏联的正统性曾是一个幻觉, 但至少当初看起来却是真实存在的, 以至于鼓舞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下定决心提出了“公开化”制度。一名西方苏联民族问题专家当时指出: “‘公开化’主要表达了 (戈尔巴乔夫政权) 对苏联体制正统性的信心”, 也反映出苏共自信“掌控大众忠诚和谋取拥护已不再必要”。<sup>8</sup> 大众的拥戴曾经是历史事实, 只是在随后的突发事件中才消失殆尽。然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能用来论证苏联解体只是源于系统的内在逻辑, 因为一个内在逻辑注定失败的体系怎么会铸就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信心! 苏联领导人冒险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事实告诉我们, 以体系逻辑论来阐释苏联解体是谬误的。

同样还有一个基本问题, 即苏联为何被认定为一个不可变革的政体, 也就是它的不可变革性

<sup>1</sup>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80).

<sup>2</sup>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sup>3</sup> 【原文注释】写于 1969 年, 阿莫瑞克 (Andrei Amalrik) 是仅有的一位预见到苏联将会沿着民族界限分裂的学者, 不过他认为这一分裂将源于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 而非由于内部改革所导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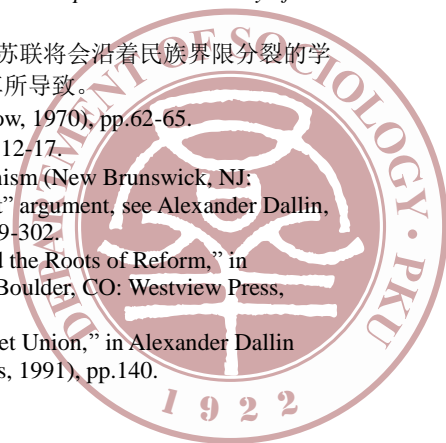
<sup>4</sup>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62-65.

<sup>5</sup>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17.

<sup>6</sup> Martin Malia, “Leninist Endgame,” in Stephen R. Graubard, ed., *Exit From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p.60. For a critique of what he called this “essentialist” argument, see Alexander Dallin,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Post-Soviet Affairs*, vol.8, no.4 (1992), pp.279-302.

<sup>7</sup> See, for instance, Peter Hauslohner, “Politics before Gorbachev: De-Stalinization and the Roots of Reform,” in Seweryn Biialer, ed.,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p.41-90.

<sup>8</sup>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140.





如何变成了玛丽亚所说的“历史事实”。显然，从现在来看，已经发生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必然性并不包含偶然性。事件发生与否的可能性，已被历史的不可更改性湮没了。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具体策略。“当一名历史学家反思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概率时，他竟然通过大胆的设想能够穿越时空，将自己放到事发之前的某个时间，以此判断该段历史演进的所有可能结果。”<sup>1</sup> 在苏联解体这个案例中，在事发前几年，大多数身临其境和置身事外的人都没有发现（解体）这种可能性。苏联解体难道是因为它固有的不可存续性？我们现在准确判断它的不可存续性，恰恰是因为它已经解体的事实吗？胜者为王，他们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所做的解释就是历史事实。但是，以“不可变革”为论据来解释苏联必然解体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有关苏联不可继续生存的判断都是在事后做出的，而并非事发之前的预测。正如柏林所言，目的论的解释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只能是一种宿命论。在此个案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的论进行质疑。在相对较短而又非常紧迫的时段内，苏联解体在国内、国外大众观念中从“完全不可想象”到“不可避免”的事实，解构了“列宁主义内在逻辑诱发了苏联解体”的这种阐释，因为它无法解释人们在短期内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转换。

相似的问题困扰着其他一些被广为接受的阐释方式。老生常谈的一种解释是：因为其前身本来就是一个庞大帝国，所以苏联会解体。从这一视角看，苏联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一这早在苏联建立时就决定了——而且是根植于布尔什维克制度内在的帝国本质。<sup>2</sup> 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自决成为一个普遍认可的准则时，世界上所有的帝国都注定要消亡，并由此推断：因为苏联是一个帝国，所以它无法抗拒解体的宿命。这些观点面对着相似的困境：苏联之所以会解体，是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帝国呢，还是因为它解体了，所以才被指称为帝国？大量的“帝国想象”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应运而生。而在苏联改革前夕，却从没有人以“帝国话语”来描述苏联的民族（nationality）问题。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曾批判过这一流行的帝国话语：

在国际法律体系和主流政治话语中，苏联被认作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地结合体，不过这一想象只是服务于冷战战略，……而不太可能说明苏联核心区域与非俄罗斯边缘地区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苏联个案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特殊元素，但将其归入当代世界“民族-国家”的信条中进行权衡辨析，并依据其他帝国解体的经验推断来演绎苏联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不令人信服的。<sup>3</sup>

整个冷战期间，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苏联及其内部结构描述为“国家”（state）而非“帝国”（empire）的组成部分。诚然，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诸国常被指认为“被俘虏的民族国家”。但是，“帝国类比”曾经只是偶然出现并掩盖了苏联的“多民族国家”特征。相反，当苏联终结之时，它突然又被广泛地公认为“多民族帝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一个曾被公认为“国家”的政体为何突然被指认为“帝国”？这里的关键是：那些有兴致研究苏联分裂的学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解体是否不可避免，而是早先令人无法想象的解体如何在突然之间被公认为“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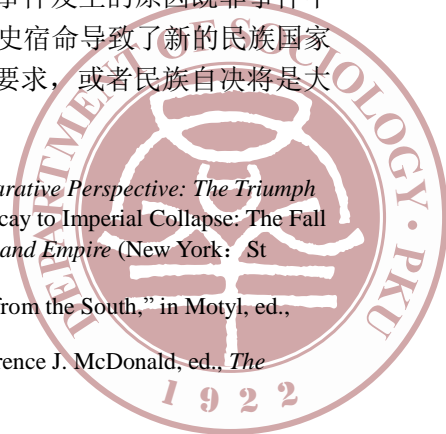
目的论解释违反了因果关系的一个根本属性：事件的发生，部分源于个体动机和行动，即使行动产生了某种非预期后果。实际上，目的论阐释可定义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既非事件中的行动及其反动，也非形塑行动的特殊而具体的情境，而是抽象的历史宿命导致了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sup>4</sup> 向民主与自由进军是大势所趋，是现代化与市场的必然要求，或者民族自决将是

<sup>1</sup>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p. 125.

<sup>2</sup> See, for instance,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Alexander J. Motyl, "From imperial Decay to Imperial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avid Good, ed., *Nationalism and Emp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5-43.

<sup>3</sup> M. Crawford Young,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xestion and Marxism: A View from the South,"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pp. 91, 97.

<sup>4</sup> William H. Sewee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势所趋，不管是三项机理中的哪一个，目的论始终强调的是结构决定论。结构的作用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之一，在社会互动中，结构驱动、促进或规制人类行为，使其成为一种或然率的、有条件选择的事实。但目的论不是或然率的。它将个体行动视为结构的副产品，好像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并非有意识的，而是由一个来自个体之外更强大的逻辑或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

在有关苏联解体的文献中，结构和行动（agency）的因果互动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诚然，有大量注意力集中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sup>1</sup> 也有大量文献关注促动变迁的民族主义运动。<sup>2</sup> 但是，大多数学者强调制度、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化和民族主义运动爆发铺设道路的社会结构条件。<sup>3</sup> 前者单单强调特定的个体和行动而忽略了制约行动的社会因素，后者却相反对引发解体的实际行动避而不谈，仅仅将解体视为苏联特殊制度设计和社会过程的应然结果。正如某些文献回顾所述，对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社会科学解释有过度宿命论的倾向。<sup>4</sup>

甚至有人声称，苏联瓦解与“公开化”期间集中爆发的社会动员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指出，分裂是因为权力精英对核心体系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们对政体结构进行改组，内阁官员趁势瓜分了苏维埃联盟。<sup>5</sup> 但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公开化”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失利致使苏联体系凝聚力耗散，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并成为苏联终结的致命一击。在革命、暴动、剧变的那段特殊时期，成千上万的群众每日走上街头，各类运动风起云涌，由此可知，把解体归因为统治精英政体改组或内阁官员瓜分国家资源的解释难免牵强。他们终究不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以分裂为若干个民族国家而终结，而并非只是政党更替。他们无法解释苏联解体曾经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而后来如何变成了不可避免。实际上，内阁官员瓜分公共资源只是国家分裂的一种表现。

与苏联解体关系密切的结构和行动（agency）及其交互作用，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中被给予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苏联垮台主要源自民族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以及“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运动进程中对苏维埃联盟是否应当继续存在这一意识态度变化的作用。近年来，民族主义研究经历了一次范式转换。学者们渐渐达成共识：民族主义具有模糊性、任意性和建构性特征，文化认同具有动态性、嵌入性和叠合性。本书并不想推翻这个共识，只是特地以此为基础，引导人们理解民族主义的性质，让那些曾在苏联解体研究中犯了错误的观察者，避免在其他情境下重蹈覆辙。在经验研究层面，其核心任务是描述人们对苏联解体的观点如何从“不可能”转变为“不可避免”。在理论层面，主要回答民族主义行动是如何既是某些事件的原因，又是其他事件的结果。

---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247.

<sup>1</sup> For a few of the many works on Gorbach's impact on events, see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Mark Galeotti, *Gorbachev and His Revolution* (New York: Longman, 1998); Robert G. Kaiser, *Why Gorbachev Happened: His Triumph and His Fail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The Russian literature is also enormous.

<sup>2</sup> Among the numerous English-language works, see Rasma Karklins,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Latvi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Rein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Alfred Erich Senn, *Gorbachev's Failure in Lithuan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Jane Dawson, *Eco-nationalism: Anti-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ras Kuzio and Andrew Wilson, *Ukraine: Perestroika to In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1995); Jan Zaprudnik, *Belarus: At a Crossroads in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sup>3</sup>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Theory and Society*, vol.23 (1994), pp.47-48;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David 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sup>4</sup> See Stathis N. Kalyvas, "The Decay and Breakdown of Communist One-Party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Science*, vol.2 (1999), pp.323-43.

<sup>5</sup>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Steven L. Solnick,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结构/行动 (agency) 的争论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普遍,但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这一问题在有关苏联解体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大量著作试图揭示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之起源,认为只要理解了起源,就能够推断这一现象的普遍本质。大多数学者把民族主义现象看成社会利益或身份认同的一种逻辑结果,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上形成的或由广泛的社会力量的作用而突然浮现的。在他们的阐释中,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许多理论都是目的论取向,将民族冲突描述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实现,是民族自决的普遍规范或者是工业化的后果。<sup>1</sup> 在事实上,行动中的认同是情境性的,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可建构的、变动不定的现象,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动态机制。

大多数研究将民族主义行动单纯地理解为民族意识的客观产物,并坚持认为民族意识早在民族主义行动之前业已形成。例如,郝若琪 (Miroslav Hroch) 关注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他所命名的阶段 B (即爱国主义煽动阶段),称其为“最重要的阶段”,却忽视了民族精英如何以及为什么领导大众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非常时期 (阶段 C)。尽管郝若琪声称,“阶段 B 并不必然超越阶段 C”,他认为民族主义行动没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因为阶段 C 的发生及其内容主要取决于行动之前既已形成的民族意识。<sup>2</sup> 格林菲尔德 (Liah Greenfeld) 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更为偏激,他认为民族意识导致民族主义行动的基本机制,在民族认同形成的早期阶段 (即族群精英阶层怨愤情绪的生成时期) 就已启动。“民族意识对各民族 (nation) 政治、社会、文化构成以及历史编写的影响,都源于这些最初设定的民族动员目标,而非 (即时的) 大众的民族化。”平心而论,格林菲尔德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历史的钳口,往里增添了这样一种观点:民族意识并未“彻底形塑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表达”或决定各民族成员的行为举止。民族主义只是创造了“一种行动的先决条件,以及某一情境下这一行动发生的概率。”<sup>3</sup> 然而,在怎样的情境下会出现行动、以及先决条件如何转化为行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先决条件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吗?为什么有些先决条件可以转化为行动,而另外一些却不能?抛弃“思想到行动” (thought-to-action) 的理论范式,先决条件能够自己出现并转化为行动吗?

这些问题并非无足轻重。相反,他们恰恰是隐匿于我们民族主义知识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 (重要的是,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政治现象)。在民族主义研究的杂乱无章的发展变化中,学界主流注意到了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正是他们建构了标准化 (民族) 语言、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开始质疑“思想到行动”的理论范式。根基主义 (primordialism) 和工具主义 (instrumentalism) ——前者强调认同的情感依附特性,后者把认同定义为自我利益的表达——两者都是结构决定论,把行动认定为民族意识或自我利益的逻辑结果。相比之下,结构决定论已展示了民族主义行动如何通过书写和其他媒介进行表述,以及如何依据边界定义和其他形塑共同体想象的分类图式划分出政治空间。但是,结构主义并未诟病这一命题:民族主义缘何不经过中间机制而自动跳跃至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各类问题,我将以民族主义政治中的抗议事件为研究对象。布鲁巴克 (Rogers Brubaker) 早已提出:“我们今天急需一个关于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事件分析的精致理论。”他说:“我们有大量成熟的、发展取向的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研究成果,这些文献追踪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以便考察这些变迁如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生成。”一些著作视民族主义为群体的一个固有的常量,而非时间变量。但是,布鲁巴克说,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常量

<sup>1</sup>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eleological and functionalist aspects of Ernest Gellner's theories, for instance, see John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2</sup>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 N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2-24.

<sup>3</sup>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23, 25.





(constant)。它是一种变动不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并不总是渐进发展，有时也会突然结晶而成。据布鲁巴克观察，那些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缺失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方式有时并非渐进形成，而可能是突然结晶（crystallize）而成，是一种偶然、失常的波动和不稳定的想象。<sup>1</sup>

这么说并非指民族主义事件研究是一个空白。相反，研究世界范围内特定民族主义冲突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研究民族主义事件和民族主义的事件分析是有差别的。<sup>2</sup> 事件分析视角以时间和行动为中心，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条件下，探索行动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它要求民族主义不仅应被理解为行动的原因，民族主义同时还是行动的产品。这是人类行为的循环递归特性，即行动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这便是本书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试图处理的理论议题。

### 结构促进，制度约束和抗议事件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sup>3</sup>概念为分析民族主义行动的递归属性（recursive quality）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sup>4</sup> 不过，这与我的研究进路有些不同。我和吉登斯的研究旨趣是一样的，即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社会实践（在这个案例中特指民族主义实践）如何得以再生产和重构。此外，我也接受吉登斯关于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基本理念，即结构始终贯穿于行动之中并影响行动，行动反作用于结构的形成和重构。然而，本书不会完全遵循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的分析进路。因为我赞成阿切尔（Margaret Archer）对该理论的批判和评述。她指出，在吉登斯试图纠正他所认为的结构与行动的错误二分关系时，他实际上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削弱了该理论的分析价值。<sup>5</sup> 的确，如许多批评指出，吉登斯最终被迫重新解释了他曾试图废弃的这一“二重性”，因为他在具体研究某一事件时，为关注结构或行动中的某一项，就不得不忽视另外一项的反作用。当我致力于说明结构和随机因素可能促进或约束行动时，结构化理论为理解这些关系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它并未提供一个分析递归关系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把结构和行动视为因果而非递归关系，结构化理论不能区分它们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联系。吉登斯强调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和结果，同时他还过分估计了结构的促进功能，而低估了制度和规制对行动的约束作用。

一个更加合理地处理方法是，将结构对行动的影响分为三个相互影响的层面：既存的结构条件；制度的约束作用；以及行动自身对后续行动的影响。<sup>6</sup> 我所使用的“既存的结构条件”（pre-exis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指的是结构促进行动的一个面向：积累的资源，既定的行为方式，促进行动的规范准则。这里，我接受吉登斯行动者嵌入社会结构并受其影响的观点。但是，我把这类结构影响的形式分解为“事先存在的”和“情境性的”，以便反映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影响是社会情境所赋予的，在任何时候都是行动者必须面对的，并影响他或她行动成功的概率，哪怕这些情境或条件被当时的行动所改变。举例来说，行动时，个体无法超越或改变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复杂程度、地理位置及其边界，过去的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情境。这些情境或条件是由过去的行动者创造的，嵌入社会现实中，对行动者的资源和预期施加影响。在这一意义上，结构被理解为行动的催化剂。当然，并非所有的既存结构都是行动成功的必要条

<sup>1</sup>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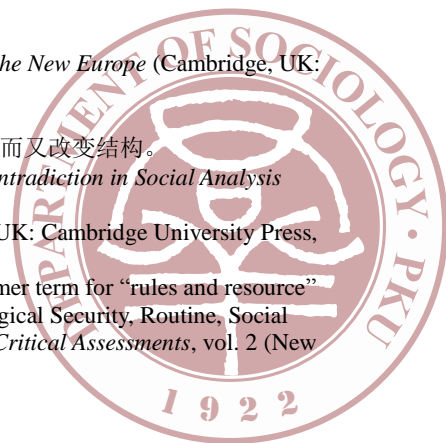
<sup>2</sup> The term itself comes from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pp.245-80.

<sup>3</sup> 【译注】“结构二重性”：结构既为行动提供资源又约束行动，行动受结构约束而又改变结构。

<sup>4</sup>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sup>5</sup> Margaret Archer, *Realist Social Theory: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5.

<sup>6</sup> Giddens draws a similar distin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order, but reserves the former term for "rules and resource" and the latter for the patterning and repetition of action. See J. D. Mendoza, "Ontological Security, Routine,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G.A. Bryant and David Jary, eds., *Anthony Gidden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2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271.



件，某些条件的缺失可能导致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降低，但未必会使行动失败。从这一意义看，既存结构往往是利于行动的，而不是相反。它们的影响是累积性的，尽管跨越时间，但通过社会情境使其作用在某一空间变得清晰可见，因为在任何一个既定时刻，社会资源都有利于一些特定的个体采取行动，并助其成功。

结构影响行动的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制度规制实现的。制度在社会事务中具有灌输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的权力，以此限制行动，积极为行动者规定实现自身利益的合法途径，并采取强制措施对非法手段予以禁止。制度的规则性和可预测性，源自它们制定和强化法制、排斥挑战性行为的社会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使制度具有大量常规法律属性，也就是说，通过强化社会规范，制度建构了一套符合规则或规范的行为和期望，以便规则的内在逻辑属性内化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之中。与既存的社会条件不同，规定或强制的规则以及制度的可预测性并非随机现象；制度主动规范社会现实，并通过奖励按规范行事、惩罚或边缘化越轨者来内化规范的确定性。举例来说，在将民族国家观念强加于大众时，政府已经通过排除那些倡导其他政治单元的权威而再生产了民族主义的特定话语，奖励那些认受该话语的个体或群体，并对大众实施社会化，让人们认受国家精英规制的民族主义思想。精英对民族国家进行重新定义或建构，部分是通过民族国家实践的制度化，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形成的民众期望。但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制度实践具有随机性。这一随机性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但对行动同样具有显著作用。比如说，制度实践中对政治机会空间的开放和关闭，往往会改变人们对挑战一个政治制度成功可能性的主观判断。<sup>1</sup>

结构影响行动的第三个层面来自行动自身以及我在本书中强调的“事件”(event)。我把事件理解成潜在的颠覆性行动，挑战了正常的实践、因果模式或权威系统。<sup>2</sup>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事件定义为打断常规过程和例行程序的群体性行动，<sup>3</sup>从而抓住了事件的本质属性，即越轨者的目标是推翻而不是重建，颠覆现有政权或秩序。在这层意义上，事件与常规、常态截然不同，与维系、支持现有权威体系的行动相左，因为使行动成为事件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现行制度对立并致力于瓦解它”。<sup>4</sup>一个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伺机颠覆常态的人提供了行动的时机和条件。

如格里芬(Larry J. Griffin)所言，事件分析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因为通过事件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碰撞和互动。<sup>5</sup>并非所有事件的政治影响力都是同质的。塞维尔(William Sewell)发现，有些事件致使政体更替，远比那些权力重新配置和政治战略调整等社会运动来得猛烈，这些事件不但改变了政治、社会分类的文化意义和内涵，还从根本上重塑了大众的集体忠诚和群体行为。<sup>6</sup>然而，另一些事件并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政治后果，甚至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事件发生，并不意味着没有危机或挑战存在，只是挑战还未被发现而已。挑战的觉察与发现，通常都是在一系列小规模、扩散的、无组织的、有时是模糊

<sup>1</sup>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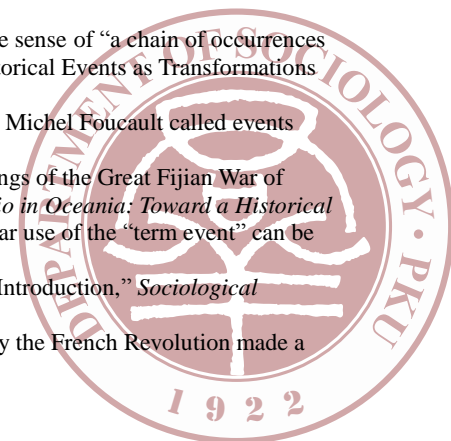
<sup>2</sup> My definition borrows heavily from Sewell, but Sewell uses the term primarily in the sense of “a chain of occurrences that durably transforms previous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William H. Sewell,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1996, p.843.

<sup>3</sup>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70), p.7. Michel Foucault called events “the locus of chance reversal.”

<sup>4</sup> Marshall Sahlins, “The Return of the Event, Again: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Great Fijian War of 1843 and 1855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Bau and Rewa,” in Aletta Birsack, ed., *Clio in Oceania: 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45. A similar use of the “term event” can be found within physics and geology.

<sup>5</sup> Larry J. Griffin,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0, no. 4(May 1992), p. 413.

<sup>6</sup> William H. Sewell, Jr.,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8, no. 4(1990), p.548.





的、不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行动发生之后。此类扩散性行动大多存在于公众的视野之外——这被斯科特（Scott）称为“秘密抵抗的抄本（hidden transcripts of resistance）”。<sup>1</sup>或许，某些秘密抵抗行动可能会引起事件般的关注效应，但这些行动往往只具社会性，不具事件性。一个事件不仅需要两类对立的行动者（支持和挑战现有政体的两个群体），而且需要第三方参与者（旁观者）。与秘密抵抗行动不同的是，庞大的观众群的出席使事件变得壮观，并推动对抗升级和激化，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力量的转化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事件邀请旁观者加入行动者：甚至当旧体制仍在发挥作用，而新体制“新鲜出炉”时，就让观众来感受并证实旧体制之替代者的卓越。<sup>2</sup>通过这种方式，事件潜在地削弱了旁观者对旧体制的顺从、忠诚和认同。

理解事件背后的政治，最重要的事实是，事件发生以及对民众认同的争夺并非随机发生的。它们的出现既有时间性，又具有空间性。一些善于利用既存结构条件的人，比他人更加快速、频繁地发起挑战，并竭力扩大这些挑战的影响。事件在一定时段内以链条、系列、波浪、环、浪潮等方式集中爆发（cluster），形成一种高潮迭起、旷日持久的巨大挑战。挑战行动的集中爆发，这在社会运动文献中并不鲜见，此刻行动摆脱了制度的束缚。统治集团的分裂、言论自由、竞选活动、军备竞赛的严酷压力、财政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镇压反抗运动的失败、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挑战成功的示范效应——凡此都会激励反对派发动挑战，并改变那些挑战者对挑战成功概率的评估。同时，危机直接损害了潜在动员对象的权益，提供了组织挑战所需的政治空间，因此为挑战的出现提供了合理性。但是，事件的簇发（cluster）突现，并非单纯是因为执政者和挑战者力量均衡的客观转换，而是由于原先维持秩序的规则创造了一种理念，即常态社会需要一些必备要素，但各类危机的纷纷呈现表明当前政体中的常态要素已不存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既存政体的合法性，激发群众向往替代性政权，并因此形成了挑战事件的“机会”空间。<sup>3</sup>

挑战性行动不只簇发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它们也有许多跨越时空的联动机制：以往本地或外地的斗争叙事激励代理人采取行动；先发动的胜利提高了人们的成功预期，利于后续行动；对旧秩序维护者进行劝说，改变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根据国内外政治环境适时转变事件的意义图式，调动各种力量推进行动。众所周知，所有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们绝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模式重复发生。可是，表面上看似独一无二的事件实际上与更大的、相关的斗争串联在一起。这一联动操作也可跨越空间，远在他处的挑战行动能够激发另一个空间里的相似行动，因为行动发起人常常把它们串联起来，这是一种动员策略。

事件的跨时空联动和簇生性爆发是解释一些意外事件的中心要素，因为挑战行动最初引发的后果变成了后续行动链条上的原因变量。当制度约束弱化，反抗事件的跨时空联动和集中性爆发，已发事件可为后发行动建构一个结构化模式，具有示范和强化作用，并改变人们对未来行动的成功预期，后续行动可亦步亦趋的持续发展。在这一方式下，事件可以成为自身的因果结构。事件能够激发其他相关领域和地域的挑战行为。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的影响总是嵌入在事件之中。<sup>4</sup>但是，一个再生产的事件链条逐渐发展壮大，以致于最初对行动具有显著性作用的结构因素渐渐变得软弱无力，直至在后续事件的发展中销声匿迹。统计学家把它称为“白噪声”（white noise），<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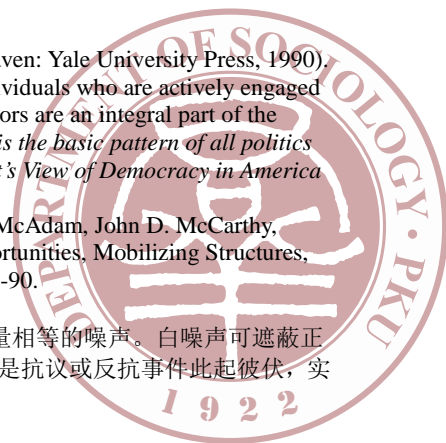
<sup>1</sup>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2</sup> E. E. Schattschneider observed that “every fight consists of two parts: 1) the few individuals who are actively engaged at the center and 2) the audience that is irresistibly attracted to the scene. The spectator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ituation, for as likely as not, the audience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the fight....This the basic pattern of all politics [emphasis in original].” E.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 2.

<sup>3</sup> 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5-90.

<sup>4</sup> See Sahlins.

<sup>5</sup> 【译注】：白噪声，是指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各等带宽的频带所含的噪声能量相等的噪声。白噪声可遮蔽正常声音或其他噪声，而成为耳朵能够听到的最高声音。作者以此打比方，意思是抗议或反抗事件此起彼伏，实



或事件跨时间发生的随机分布，在这一情境中，事件完全变成了自身的因果结构。“白噪声”是政体彻底崩溃的一种表现，一种霍布斯式（Hobbesian）<sup>1</sup>的世界，在发生的事件潮流中先前的结构已完全失去作用，事件的可持续生产变得可能，既有制度外的异端变成了现行制度。在这一情境中，反抗事件正常化，反常行动变得正常，并成为自身唯一的评价标准。然而，白噪声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出现的——在社会动荡中建立了一个临时国家。尽管那些蓄谋瓦解旧秩序的反对派，力图建立一套新秩序（将挑战制度化），但是，运动的变幻莫测和不可预知往往致使举国上下混乱不堪。甚至，一个国家通过制度化建构新秩序的任务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不可逆的过程最终变得条理化，在原有规则之外，条件不成熟的情境下，替代旧体制的新制度得以仓促建立。

乍看起来，上述方法与民族主义和苏联研究似乎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当我们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颠覆或维护特定制度的政治行动时，这种联系才会凸显出来。当今，如果行动者不是努力定义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并以此孕育争端，鼓动挑战，民族主义将不是一种颠覆性力量。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把模棱两可的、有争议的转换为常规的及表面上自然的，将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强加于极度复杂的文化现实之上。<sup>2</sup>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并非单纯的想象的共同体；从根本上看，它控制了定义共同体的标准，并控制了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在这一关于想象控制的竞争中，事件以民族主义为主要话语来赢得人们的忠诚。

### 秩序、事件和民族主义浪潮

从人类共同体的现代用法来理解，政治自决主要基于一个共同体自身的权力诉求：民族国家总是占据一定的领土，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将其公认为一个不可辩驳的“社会事实”。民族国家被民族主义者想象为永恒的政治实体。然而，吊诡的是，民族主义信徒的行动目标是把民族转换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分类——建构共享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建立狂热分子的想象的民族国家。在这层意义上，行动嵌入于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者通常在谈及一个民族的“诞生”或“重生”时，就标志着一个共同体从不稳定、模糊的人群分类开始向自觉的共同体转换。这一时刻的仪式性重演，确证了民族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并向社会持续重复宣告民族的真实存在，似乎民族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从未而且永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一个自我肯定的实践证明民族是真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实在性。

为探究民族主义行动的这一角色，在本书中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假定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旧国家机器与那些试图通过制造分裂事件而推翻或改变旧体制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正在上演。现代国家已把一个政治制度的特定形式强加于民众——民族国家制度——政治组织中一种特定的现代模式，建立在一定领土和成员共同体的基础上，有一套固定的、普适的文化规则。上述主张并不新奇。<sup>3</sup> 民族主义解决的是认同和利益（stakes）问题，因为在现代世界这些都是重要议题。这些议题不仅涉及人类认同的情感联系，还涉及他们和统治权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类情境下，政治权威统治着一定的疆域，通过情感和权力把自身合法化为某一资格群体，并努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大众期望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生活机会等一些重要层面的利益能够在国家领域内得到保障。确实，使民族主义区别于其他竞争模式的恰恰在于它能够集中于这一独特的政治目标——它能提出认同和利益等特定的议题，而其他政治运动却不能。

在内战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会强加于大众，盖尔纳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的“文化武装”（cultural equipment），具有强制性、实质性和规范性的力量。盖尔纳解释说，国家

---

现了可持续再生产，最终占据了霸权地位。

<sup>1</sup> 【译注】霍布斯式的世界：既有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社会进入自由主义状态。

<sup>2</sup> 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pp.150-151.

<sup>3</sup>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178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为了创造、维护和常规化民族主义制度，往往会借助于枪炮、美元和书籍。<sup>1</sup> 他们不仅想要最大化地更新**民族共同体**的版本（versions），而且要努力推动**民族共同体**特定版本的国际化。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努力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构边界、认同和文化规则，把自身的出现建构成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改变的和永恒长存的。回到我们研究的个案——已经终结的苏联，苏维埃政权曾经竭力把自身装扮成牢不可破、永恒长存的合法国家，使本国人民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确信它是不可挑战的，以至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深信其民族问题已得到解决。在解体前夕，甚至那些想要颠覆苏联的人，也相信它是不可撼动的。苏联的案例表明，某一事件发生前后，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评估会有一个重大调整，事发前通常会把一个既定的制度安排当成不可变的、自然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发生。<sup>2</sup> 事发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集体记忆渐渐变淡，最终被排出脑海。一些人甚至在后来会认为某一事件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是自然而然的。借助这一方式，国家制度成为维护现实和认同的主要行动者，而这些正好是它们自己生产的，随后政府强有力地控制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相对而言，民族主义中的斗争事件，其目的在于挑战现行的国家制度。它试图打破国家强加于人民的民族主义安排，论证它们的可变性，并促使人们在有关忠诚和认同的竞争话语中做出选择。对于一个居于一定民族国家的人来说，当这个国家的领土和文化变量已被广泛地正常化，政治过程中的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边缘化，那些陈词滥调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并不再被察觉的时候，人们容易忘却民族主义本质上的矛盾性。<sup>3</sup> 正如塞尔多所言，我们长途跋涉，远赴异国他乡，以便发现那些同样存在于国内却不被察觉的事像和真理。正因为这样，（他国的）斗争事件迫使我们改变以往对民族主义想象的思维定势，并为我们对无数偶发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然而这些在本国内早已经嵌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并被人们遗忘。

在本书中，我认为事件研究对解释民族主义的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辨识结构因素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或许是社会科学、民族主义研究中理解事件的一个传统路径，即将事件看成既存结构的一个产品。在事件中，民族主义不再只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事件包括了民族主义与其他主义之间的冲突，并把这种冲突转化为行动。尽管抗议事件发生的场所并非民族主义实现具体形式的唯一场域，如精英从国家政策层面也能把民族主义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具体实践。但是，国家层面的实践只是一类精英现象而非群众现象。只有事件中的公开对抗才能直接检验人们的政治忠诚。如康纳（Walker Connor）所言，民族主义学者曾经倾向于关注“精英思想的大众化影响群众的民族意识，而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他辩称，相对而言，民族主义应被理解为“群众现象，而非精英现象，”尽管在那一刻，精英宣扬的某些民族主义理念内化于群众，并将该理念变成一种动员资源，但群众并未失去主体性而完全受精英操控。<sup>4</sup> 事件潜在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刻，在这一刻，不仅可考察群众对特定政权的忠诚和承诺（commitment）程度是如何变化的，而且还能研究既存结构和制度规范如何影响群众政治忠诚的表达方式。因此，事件研究对检验有关结构的因果假设是有效的。

第二，事件中行动呈现出的形式多样性值得研究。确实，形式各异的行动对探索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世界，其价值要大于对民族主义抽象符号或民族主义者宣称的特定内容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助于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实践（state practice）。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民族主义的出现并非源自人们关于民族主义的说辞与理念，而是出自行动者在民族主义名义下的实际行动——例如，人们组织、参与大选、示威运动和抗议活动等形式各异的行动，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一个充分的民族理论不仅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单元是民族国家，而且要探究我们

<sup>1</sup> Ernest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sup>2</sup> Jon Elster,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sup>3</sup>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sup>4</sup> Walker Connor, "When Is a N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13, No.1 (January 1990), pp. 92-103.





通过怎样的行动方式建构了民族国家。

第三，事件的壮观特性使事发地点成为民族意识重要的传播场所，其间群众的民族认同被强烈形塑。这里，我们开始放弃事件纯粹是结构的产品这一传统观念，从而转入事件自身有其独立的作用和后果的研究理念。群众集会的地点是民族运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其他如博物馆、剧院、纪念碑和印刷媒体），在这里民族主义话语被精英提出并加以传播，民族国家开始变得可能，并浮现出模糊的轮廓。就像戏剧一般，为人们提供了实践想象的一个机会，让人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sup>1</sup>事实上，群众在许多情境下都是一个虚假的民族，因为群众通常自视为或被运动组织者描述为民族主义先锋。但是，这种例行化仪式和制度性集会能感染在场出席的群众，并把这种民族意识传播出去。<sup>2</sup>抗议群众是一种象征性民族群体，与民族具体实在的象征符号（如纪念碑或博物馆中的实物），以及例行化、制度化的民族主义表演的差别在于传播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吉登斯把“也有其他可能性结果”视为行动的根本特征。尽管认同表现于他人预先设定的地图、博物馆和统计数字中，但是体现在行动过程中的认同才是更为重要的。因此，抗议群众在将意识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认同，易感染旁观者。也正是抗议事件结果的不确定性，才使得只有某些特定事件才能把群众的抽象认同转换为实践认同。发生在事件中的一些行动，具有改变舆论、形塑认同的能力。如抗议事件中，镇压的反弹，群体间暴力行为的宿怨，政府对大众利益诉求的冷酷无情——这些都会改变政治舆论，影响个体与权威的关系，并因此强化民族意识。事实上，那些组织和推动抗议事件的人，通常积极煽动其他群体一起响应，强化他们的冲突感和认同，以便使历史的车轮行进的更快。

第四，抗议事件的结果对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抗议事件的结果为认同表达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范例，群众目睹了这一结果，并重新评估和预测：如果把特定的认同表现出来，在精神和物质上是收益更多还是成本更大。体育比赛和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认同政治与体育竞技中的球队支持动力学如出一辙。各类认同对于群众忠诚的竞争恰似竞技队伍对粉丝支持的争夺。常胜的垒球队能够提升忠诚值和出席率。个体喜欢分享成功和荣誉，认同并加入胜利者的倾向已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得到证实。<sup>3</sup>相反，常败者会失去他的一些追随者。不过，常败者有时也能继续吸引一些委身程度较高的铁杆粉丝，委身程度较低的粉丝会转而支持一些实力强劲的竞争者——一些获胜的足球队，职业篮球队，或是职业垒球队。有时，一些粉丝会同时对垒球失去兴趣。也有可能，某些叛逃的粉丝对他们最初支持的球队仍有一些潜在的忠诚，在心理热盼球队复兴的时刻。

虽然风险更高，选择面更窄，但政治力量对文化认同的争夺和球队对球迷的争取逻辑是一样的。胜利往往赢得认同，失败削弱认同，没有比这更为强大和全面的作用机制。正如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指出的：“人们喜欢自信带来的舒适享受，虽然比赛结束前结果还不确定，但信心让人们觉得胜利将属于他们”。<sup>4</sup>抗议事件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因为此类事件的结果，为人们选择何种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强烈影响人们在这一变局中的利弊权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于大多数重新想象认同的大众，以及苏联解体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的观念转换基本上都遵循这一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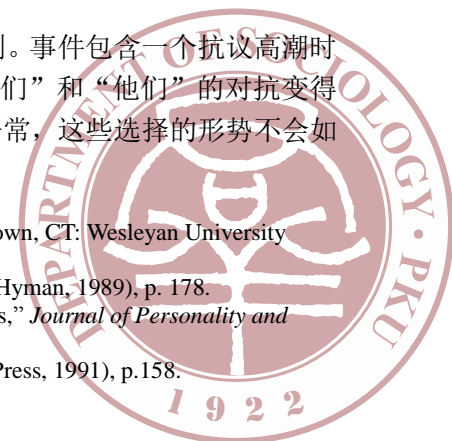
第五，事件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情境对认同策略的作用机制。事件包含一个抗议高潮时期，此时群众必须在竞争的两种认同中做出选择。在这一时期，“我们”和“他们”的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这时，机遇呈现出来，个体对认同做出抉择是必要的。平常，这些选择的形势不会如

<sup>1</sup> David Cole, *The Theatrical Event: A Mythos, A Vocabulary, A Perspectiv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x.

<sup>2</sup> J. S. McClellan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178.

<sup>3</sup> Robert B. Cialdini et al., “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Three (Football) Field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4, no. 3(1976), pp.366-75.

<sup>4</sup>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58.



此尖锐、紧迫地突显出来。在大多数时期，竞争的民族话语对大多数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通常，人类是一种“民族动物”（national animals），我们的行为被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高度结构化。如怀特（Harrison White）洞察到的，我们与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并受其约束。<sup>1</sup>由此观之，民族认同依赖外部话语在人类思想上的内在化，内化后奖励或惩罚的实施不再必要。服从，以及替代性认同的缺乏可能促成信仰的内在化。然而，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潜藏于所有社会秩序背后的规则，只是在非常时期出现——当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遭遇挑战和压力，以往束缚个体行为的外部限制被削弱——供代替的选择就会层出不穷。

在这一意义上，与勒南（Renan）的观点相反，民族国家并非真正基于日常的公民表决。在大多数情境中，正是制度控制了人们的民族想象和选择机会。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勒南（Renan）关于民族国家是一种日常的公民表决的比喻绝妙之极，其旨在说明民族主义基于人民意志，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恰当，因为一个完全由日常公民表决的政治共同体，不久必然陷入怨声载道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盲目服从的局面（hypnotic obedience）。<sup>2</sup>民族主义运动应被理解为**间断的和不规则的**平民公投，而非日常的、规则的公民表决。这类间断性表决的时间安排，主要取决于挑战既存秩序**机会的开放程度**。如同其他竞争模式，民族主义引起的解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竞技场中是悄然发生的，只有在民族主义发展到高潮时，国家及其挑战者对政权的争夺才是公开的。民族主义运动会因挫折而中断，但也会因为挑战事件的集中爆发而改变民族主义者的胜利预期，并促成民族主义跨时空联动。不同情境下认同政治如何运作，以致政体兴衰更替，这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当帝国解体时，民族国家是我们效忠的最大的共同体。但是，在政治博弈中底牌通常不会轻易出现在台面之上。它只会出现在非常情境下，在事件过程中挑战开始升级，以致到了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相互竞争的文化忠诚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这一抉择通常是在紧迫和混乱的情境下做出的，往往具有盲目性。

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政治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平静”的民族主义政治阶段，在这一政治中，国家制度保持着统治性，民族主义斗争迂回前行。而当解体变得可能，反对派便努力把一个（新的）特定的民族国家秩序强加于既存社会，并将其制度化。还有一个“喧闹”的民族主义政治时期，基于有意识的政治机会开放，其间政治秩序和制度（包括共同体边界的定义）遭遇了直接的挑战和竞争。<sup>3</sup>在两个阶段中，国家及其挑战者在争夺政治认同和民族国家界定的话语权，但是实践的领域大不一样。占有优势的竞争者可调整战略，甚至转换行动的有效目标。<sup>5</sup>许多在民族主义运动“平静”期发生的事件为“喧闹”期的事件提供条件。这在“喧闹”期早期阶段尤为明显，这个阶段发生的事件主要受到先前事件的影响，尽管随着运动发展这一影响会慢慢消失。在国家权威常规化时期，公开的抗议行动通常表现为离散的和粗放的形式。这些挑战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但是，它们受到范围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式微，并在政治进程扩大升级后边缘化。在平静时期，民族主义挑战者也倾向于把议题的范畴缩小，只有这样才能渐渐获得群众的认可，并具可行性。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等到国家权威衰弱的时候，开始富有激情地鼓动独立，然而在国家权威常规化时期，民族独立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1913年，在那场诞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前夕，建立者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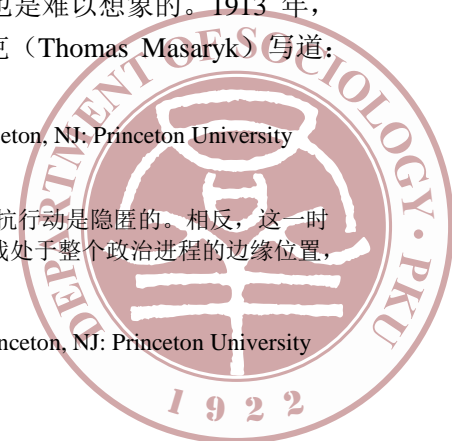
<sup>1</sup>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

<sup>2</sup>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4<sup>th</sup> ed.),(Oxford: Blackwell,1993), p.76.

<sup>3</sup> 【原文注释】平静的民族主义政治，我并非暗示此类政治是非暴力的，或者反抗行动是隐匿的。相反，这一时期，有暴力和公开的挑战行为，但相对喧闹期来说，这些针对统治秩序的挑战处于整个政治进程的边缘位置，不能引起大的波澜。

<sup>4</sup> 移入脚注中，为保持与原文注释序号一致，故保留。

<sup>5</sup> James DeNardo, *Power in Numbers: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Protest Rebell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但我知道，不管是好是坏，它都将继续存在，所以我不能沉迷于它将垮台的梦境里，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应该为这个奥地利做点什么。”<sup>1</sup> 对马萨里克来说，捷克独立在事发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过程看，事发前后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可能性形势，这就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特殊性所在。

最后，抗议事件对于解释民族主义递归效应是十分重要的（递归效应，即民族主义行动能够变成自身因果结构中的影响因素）。如上所述，抗议事件在某一时段内簇发以及跨时空联动是它的两个基本特征，这是理解民族主义事件递归效应的核心内容。的确，在挑战事件进入高潮时，民族主义发展如此之迅捷，以致人们的旧观念一闪而过，来不及加工所有的新信息。<sup>2</sup> 我从这本书里借鉴了“浓缩的历史”（*thickened history*）这一现象。“浓缩”的历史：挑战事件的发展如此迅猛，致使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变得不可理解，先发事件与后发事件构成因果关系，所以说挑战事件自身构成了一种因果结构。正如一名苏联记者 1989 年秋天的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浓缩的历史时期。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如今在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sup>3</sup> 抗议事件进程的加快，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产生了影响。前者面临国内快速增长的离心力而束手无策，后者受到事件及他人的影响，心理上的意外性和不确定性感觉被强化。在“浓缩”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把历史潜在地推向快车道，影响了每个个体与旧权威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新制度的公信力，并迫使人们在相互竞争的认同选项中做出抉择，人们在以前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选项，但此刻却要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做出重大决定。

抗议行动的簇发和联动构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汐性特征（*tidal character*）。我用“民族主义潮汐”指称一波波民族主义动员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潮汐或潮流”具有许多含义；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不下 16 种，其中一些具有细微的差别。“潮汐”仅只是一个比喻，因为民族主义抗议政治和月球引力下规则的、可预测的水流起伏是有差别的。“潮汐”最初指称恰当的或吉利的日子，这与我思考的本意比较接近。到 16 世纪时，“潮流”被用来描述海水规则的潮涨潮落（潮涨时正好是扬帆前行的恰当时机）。但是，“潮汐”一词已被用来描述非常时期人类事务的兴衰现象（如流行的爱好，公共舆论或运气），个体由于容易受他人行动的影响而盲从或跟风。“潮汐”带来的好时机，以及个体受他人行动影响的特性，是我理解“潮汐政治”的核心。

如果要把民族主义运动类比为海水，那么海啸和浪潮的比喻会更加贴切。一个浪潮通常被描述为一个“波列”（*wave train*），一系列汹涌澎湃的浪潮往往是由地壳能量的强烈震动引起的（源自海底的地震）。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易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结构条件，正如海洋盆地（尤其是太平洋）更容易产生浪潮是因为那里的地壳运动更为频繁。沿着海岸，日常由风力吹起的浅水波，其波长只有 150 码。与此不同的是，海啸发生的时间没有规律，其力量和效果无比寻常，其波长可达到 600 英里，速度可达每小时 500 英里。当它们产生于深海时，几乎令人无法觉察，一系列的波浪只有几英尺高，但是从水面到海底能够扩展数千英里。在波浪长途跋涉穿越海域时，耗散的能量很少。而当它们接近陆地时，洋底地震致使巨量海水喷涌而出，汹涌澎湃的海浪极具破坏性。海浪与海岸的撞击又把剩余的地震波送回广阔的海洋。

本书指称的民族主义浪潮与海啸有相似性，在国家体制崩溃之前，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具有不规则的周期性，其力量增长、范围扩大与结构促进（*structural facilitations*）之间相互关联。然而，本研究还要论及自然潮汐和社会潮流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在社会运动中，浪潮的能量并非来自其他强迫性或必要性力量的动力学转换，如一个弹力球通过碰撞把力量传递给另一个。相反，社会运动浪潮的能量和作用来源于他人行动对个体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或行动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感染”，从而生成了动能，而非单纯的能量转移（人类行动的一个基本特征）。<sup>4</sup> 民族主义浪

<sup>1</sup> H. Gordon Skilling, “T. G. Masaryk, Arch-Critic of Austro-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in Ladislav Matejka, ed., *Cross Currents: A Yearbook of Central European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8.

<sup>2</sup>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p. 316.

<sup>3</sup> *Literaturnaia gazeta*, September 13, 1989.

<sup>4</sup> Antony Flew and Goldfrey Vesey, *Agency and Necess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 10-12.





潮不是由单一的起始冲击生成的，而是经由行动者与他人挑战行动的联系而形成的。我们将看到，一些行动者蓄意造势，以便跨越时空传播抗议话语，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共鸣和响应，同时其他行动者企图在运动中搭便车而谋求私利。然而，浪潮通过德马里奥（James DeNardo）所说的“数目的力量”（the Power in Numbers）<sup>1</sup>，或者库兰（Timur Kuran）在研究族群（ethnic）政治时提出的“荣誉串联”（reputational cascades），也会对效法和遵从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库兰辩称，个体的族群行为的相互依存性能够在一定的临界值触动人们为保护和提高他们声誉的自我强化过程，其间个体会相互督促，以此促进他们的族群行动，在群体内部或跨群体形成族群行动的串联。他发现，这一串联属性可解释为什么在族群运动高潮时能出其不意地吸引参与者和旁观者，并能解释为什么微小的群体差异在集体的族群行动中被放大。<sup>2</sup> 库兰还提到，这一串联行为能激起其他群体相似的花车运动行为（bandwagoning behavior），<sup>3</sup> 有时会创造出库兰命名的全球范围的“超级花车”（superbandwagon）。<sup>4</sup>

“民族主义潮流”的灵感源自塔罗（Sidney Tarrow）定义的动员圈（mobilizational cycle）概念，两个概念具有相似性但不完全一致。<sup>5</sup> 塔罗把动员圈定义为“一个跨越社会系统的冲突和抗争阶段”，包括“从高度组织化部门向低度组织化部门的快速蔓延的过程”。<sup>6</sup> 他发现，反抗的快速传播是对其他国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和响应。塔罗说，抗议圈的出现是“通过模仿，参照，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抗议主题和形式的挪用，以及个体利益被早先的抗议行动影响的直接反应。”<sup>7</sup> 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在这一意义上包含并超越了抗议圈。动员圈由许多政治目标不同的各色运动组成。例如，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及 70 年代早期的抗议圈，由各种不同社会运动组成，这些运动的起因包括各类诉求，如种族平等，停止越战，环境保护，妇女权益，同性恋合法化，社会福利，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反对这些诉求的反动员（countermobilizations）。相对而言，民族主义浪潮产生于一个更大的动员圈，其间有大量实质性的强有力的相关行动。举例来说，在苏联，尽管民族主义变成了它的支配性主题，但公开性（glasnost）动员圈在民族主义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民主、阶级、公平正义构成了动员自动传染的病菌——每一个主题都有它们自己的动员框架——在不同时期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有些动员与民族主义潮流是对立的，还有一些运动与民族主义毫无联系。比如说，1989 年夏季，声势浩大的煤矿工人运动震撼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但这一动员与民族主义无关，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员圈。在苏联的案例中，民族主义浪潮和各动员圈相交，但不重合。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民族主义浪潮研究容许我们探索那些竞争性的、有实质意义的支流行动的排序状况，以及这些与民族主义动员圈彼此交织的支流运动，为何其中某些支流动员比其他支流更能引起共鸣。<sup>8</sup>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超越动员圈直径的浪潮。在塔罗（Sidney Tarrow）最初的定义中，动员圈的概念被应用到一个社会系统（通常是一个国家）中所有运动涉及的全部范围，他研究的意大利动员圈便是一个范例。可是，意大利动员圈同时也是特定跨国抗议运动的更大的动员圈的一部分，

<sup>1</sup> James DeNardo, *Power in Numbers*.

<sup>2</sup> Timur Kuran, “Ethnic Norm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putational Cascad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June 1998), p. 50.

<sup>3</sup> 盲目从众，形成声势浩大而无实质内容的华而不实的社会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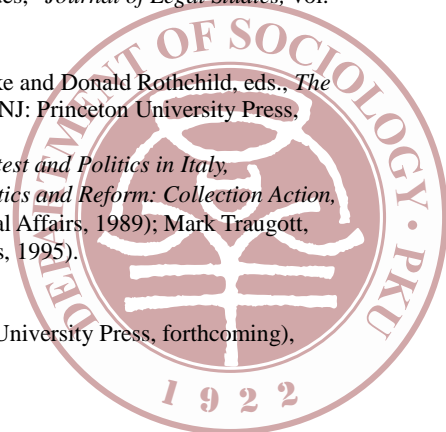
<sup>4</sup> Timur Kuran, “Ethnic Dissimil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in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0.

<sup>5</sup>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idney,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idney, Tarrow,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on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thaca, NY: Cornel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9);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6</sup>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2d ed., p.142.

<sup>7</sup>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223.

<sup>8</sup>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Chapter 8.



这个动员圈在那时囊括了所有发达的工业社会。塔罗已把这一跨国动员圈命名为“跨国抗议圈”——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都是经典范例。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发生的范围和塔罗所说的扩展的动员圈以及库兰的“超级花车”具有相似性。(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是动员圈中一个强有力、实质性的动员支流，而且是一个跨文化、跨国度的社会现象。不是所有的抗议动员都具有跨文化和国界的能力。民族主义浪潮特别强调民族运动对其他国家、族群的民族主义行动的感染和影响作用，因为一个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会带动国内和国外其他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的个案中，民族主义动员呈现了一个清晰的跨民族影响，抗议在各加盟共和国及族群之间此起彼伏，相互推动。民族主义的跨国特性，引起了特定时期国家体系的整体结构的全面变化，不仅仅是某一社会系统的激进改革和政体改组。

和动员圈的逻辑一样，民族主义浪潮的产生，主要是维护旧秩序的国家权威的一步步倒退和溃败。换言之，群体成功挑战了国家权威的某个案例，会提高这个群体以及其他群体抗议的成功预期，他们会借鉴成功经验，并付诸于行动。民族主义浪潮和动员圈一样，也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结构，如塔罗描述的，“动员圈内因早期抗议而使政治机会空间得以拓展，这项外部效应降低了抗议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动员圈内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在政体末端解除了政治机会的封闭性。”<sup>1</sup>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浪潮隐喻，使我们领略到了民族主义并非单纯的个体之间的集群或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跨文化现象。民族主义的范例事件，主要是改变了其他群体对抗议行动成功可能性的评估。在“浓缩”的历史时期，这一影响随着事件的快速发展而加速。共同的制度特征、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文化相似性的交互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正是政府在“平静期”用来支撑秩序的工具），促成了“喧闹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跨国传播和遍地开花。当外地成功经验与本地相似性、一致性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之后，本地民族主义运动就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政策和制度安排变成了多元情境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避雷针（lighting rods）。如果行动者能够建立这一联系的貌似合理性，民族主义运动成功的榜样的示范效应就能通过提高民族主义挑战者的成功预期，削弱它们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既有政权。当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去时，政治秩序的再标准化是民族主义政治从抗议运动向制度化形式转换的过程。当政治从街头巷尾转移到政府办公室时，认同制度化在此后的民族主义“平静期”确立了“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特征。

我并非说，所有有意义的民族主义动员都发生在浪潮的情境下。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民族主义抗议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疑难杂症。相对而言，民族主义浪潮是一个跨文化边界、抗议升级的特殊时期。此外，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事件或风波都能发展成浪潮。有些民族主义运动因被镇压、拉拢、或不能在目标人群中得到响应而夭折。民族主义事件能否成为风波，风波可否发展成浪潮，主要取决于激进分子能否把先前成功的案例与当前的分裂目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里，既存的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我所指称的浪潮的影响——换言之，其他行动者扩散出的影响——对解释浪潮如何取得胜利，以及特定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何成功或失败是十分关键的。既存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主义浪潮生成过程中的“事件效应”是本书研究的中心议题。

康纳（Walker Connor）说，“民族主义的历史表明了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特性，……每一次实在的民族运动都能激起一系列后续运动。”<sup>2</sup>诚然，现代国家都曾断断续续地经历了数次民族主义浪潮，取得成功的一些国家已经引起了国家体系特征的结构变革。美国和法国革命揭开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牵动了欧洲的许多群体，加勒比人和美国人卷入了重新定义政治共同体边界的斗争之中。<sup>3</sup>1848年，“民族主义的春天”出现在欧洲，急剧膨胀的民族主

<sup>1</sup>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1st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4.

<sup>2</sup> Walker Connor, "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1973), p.10.

<sup>3</sup>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eds.,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8).



义意识和野心突然爆发。<sup>1</sup> 其他的民族主义动员分别在 19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和 20 世纪头 10 年席卷了沙俄、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紧随其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新的国家出现了，用奥特（Peter Alter）的话说，“如同一道滔天海浪席卷了芬兰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所有地域。”<sup>2</sup>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自治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都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公开化浪潮——如同先前的浪潮——都是民族主义诉求和野心突然膨胀的产物，民族主义幽灵徘徊于多个群体和国家之间，并广泛地改变了国家体系的结构。

虽然民族主义以往也用浪潮来描述，但很少被作为潮汐现象来研究。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浪潮特征的研究——在这一机制中，在特定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内或之间，民族主义行为受先前的民族主义行为影响——构成了下文的中心议题。实质上，我要阐述的是，挑战一个特定国家制度的行动，如何构成了民族主义认同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本书中民族主义的事件分析仍然重视时间、地点、行动和过程；它避开了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并强调了民族主义研究中历史的重要价值。凯杜里（Elie Kedourie）在其民族主义研究著作中写道：

描述民族主义在各类政治形态中的传播、影响和作用，是在书写事件史，而非思想史。这是理解某一处于特定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政治形态和关注某些处于具体情境下的行动者的问题。特殊事件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特异思想的一致性，所以历史学家必须相应地确定其战略。<sup>3</sup>

将要阐明的是，抽离民族主义事件的因果角色并非将民族主义归入以外事故的范畴。相反，我要把民族主义定位于群体和个体做出的重要选择和限制这些选择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加以研究。

### 研究计划和内容提要

1987 年以来，洪水猛兽般的抗议事件一波波吞没了苏联，并最终在 1991 年促成了苏维埃联盟的崩溃。这一进程为我们探索既存结构条件、制度约束与民族主义行动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晚期世界上出现的最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最值得关注的“革命”现象，因为这些民族主义事件致使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所以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sup>4</sup> 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公共政治叙事和政治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前文提到的，曾以为苏联“不可能”解体的大众，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突然把思维转向了“（解体）不可避免”。一个曾经被广泛认同的国家政体，顷刻间被人们普遍地认同为“帝国”。这些年出现于苏维埃联盟的民族主义浪潮超越了苏联的疆界，席卷了东欧、中欧，1989 年进入巴尔干半岛，然后又返回苏联，在其解体后又向外部传播。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范畴。据葛尔（Ted Gurr）观察，1985-2000 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族群（ethnic）运动起始于 1989 年到 1993 年；它们中的许多冲突与苏联解体有直接关系，还有一些运动与其有间接联系。<sup>5</sup> 本人试图进行一项完整的民族主义公开化（glasnost）浪潮的研究，将要广泛涉猎，在跨国层面上探索浪潮如何跨越边界，以及苏联的民族主义动员示范效应如何能够或不能影响其他国度或区域的民族斗争，如加拿大、克罗地亚、新疆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这一任务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和能力，并需要更多的调查。不过，我们将看到，当民族主义在族群内部以及族群之间传播时，民族主义政治的潮流特征就会变得十分明显，而这恰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

苏联原住民的多元化特征，以及他们在这—时期中对待民族主义信息的不同反应，有利于我们探求不同群体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异质表现，尤其是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1989 年，苏联有 127 个官方认定的族群（ethnic groups），这些族群包含了世界上存在的大部分宗教和语言。这些

<sup>1</sup> Kedourie, *Nationalism* (4<sup>th</sup> expanded ed.), p.xii.

<sup>2</sup>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2d ed. (London: E. Arnold, 1994), p.109.

<sup>3</sup> Kedourie, *Nationalism* (4<sup>th</sup> expanded ed.), p.139.

<sup>4</sup> Charles Tilly,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3), pp.234-35.

<sup>5</sup> Ted Robert Gurr, "Ethnic Warfare on the Wane,"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3 (May-June 2000), pp. 52-64.





群体间具有不同程度的融合，生活在不同的人口和政治环境中。虽然关于“公开化”（glasnost）的介绍，为我们开启了民族主义研究的“瓶盖”，但是并非所有的群体在民族运动中的表现都一样，活动的时间也有差异。“潘多拉的魔盒”的比喻通常被用来描述苏联解体，但这一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在许多个案中，“魔鬼拒绝走出盒子”，或者这样做也只是在他人行动的影响之下。在民族主义框架传播过程中呈现的结果多样性，以及民族主义跨越地域这一特性，使其成为我们研究民族主义政治中行动和结构相互作用的典型案例。

一些人或许认为苏联是现代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最具压制性的独裁政府的典型，因此不适合用来研究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苏联的政治控制如此广泛和夸张，才能清晰地剥离制约行动的结构效应，而这在那些控制更为宽松的国度是难以做到的。某种程度上限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而且苏联个案以及本书描述的机制运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所有的政治体系。民主理论使我们期望所有社会部门高度开放，政治机会和国家强制的限制在抗议动力结构中作用很小，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冲突往往通过制度化渠道得以调和，而非转为街头（抗议）。然而，这只是理想，现实中即使是那些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抗议运动跨时空的簇发和联动——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制度化渠道内——都已在历史舞台上上演，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苏联似乎在抗议动力机制中的表现有些放大效应，但这一机制在某些政治控制力更弱的国度里具有普遍性。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一波波浪潮的相互推动，苏联就不会解体。而并非如同**结构决定论**所解释的（潘多拉魔盒的想象）那样：苏联垮台是由于分裂主义在四年“浓缩”历史中获得了某种动力，这一动力源自苏联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并想当然地认为是这一结构因素决定了它的解体宿命。在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里，可想象的边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运动之间交叉影响，与浪潮发生相伴随的制度解禁，为民族主义诉求创造了表达机会，而这些在常态时期是无法想象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结构性障碍，但依然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运动能够诱发一系列的后续运动。确实，如果没有浪潮效应，大多数民族主义都将注定失败。而且，浪潮对其他政治行动者影响深远。苏联制度的强制能力被一波波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族际暴力削弱瓦解了，规避了苏联保护自身免于分裂的能力。还有，当浪潮的动能蓄势待发时，它们变成了既存政治精英据为己有、加以利用的一股力量。曾一度忠诚于苏联的权贵精英——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s），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米耶夫（Mintimer Shaimievs），以及尼亚佐夫（Saparmurad Niazovs）<sup>1</sup>——如果不是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的启动，他们不可能乘乱取胜，变成各自民族国家的教父。如果不参照浪潮力量的作用，这是单纯的民族主义结构论无法解释的。概言之，民族主义浪潮的视角对理解苏联解体具有重要作用，原因是：

（1）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运动如何从同类行动中获得动力，促使其更容易获得胜利；（2）它有助于我们探索，浪潮以怎样的方式，解除了强加在民族运动之上的制度约束，从而创造了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传播的基础条件；（3）有助于我们理解既存的社会结构条件通过什么方式转换成实际的民族主义行动；（4）它解释了在一些案例中，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并未成功动员平民百姓，但却在政体、政府管理体系内部取得了成功；（5）它允许我们把单个事件的因果效应放回社会科学研究正确位置，从而避免了目的论、决定论和非历史的解释模型。

本书的研究计划如下所述。在第二章，我介绍了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以及它与更大的动员圈之间的关系。我考察了苏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殊的结构条件，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危机，国家和政体的裂变，多个群体中内隐的不满，向国外延伸的战线过长等。我试图解释这些条件如何使苏联在面对民族主义运动时脆弱不堪，以及为什么民族主义动员在诸多运动中占据了动员圈的主流位置。第二章也描述了抗议行动如何在公开化时期起初为试探性的，随后却成为一个跨民

<sup>1</sup>【译注】阿利耶夫、克拉夫丘克、米耶夫、尼亚佐夫曾分别为阿塞拜疆、乌克兰、鞑靼斯坦、土库曼共和国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他们均变身为各自民族国家的开国总统。

族的民族主义动员浪潮，一个行动成功之后就会为后续行动做出示范；民族主义抗议行动最终如何变得司空见惯，并形成了一个大的分裂浪潮，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凝聚力；以及抗议风波如何通过它在国家结构中的局部制度化而平息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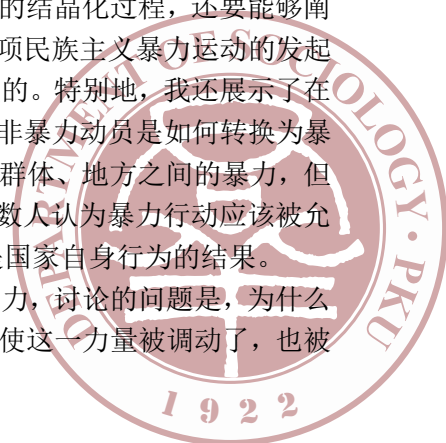
第三章通过一个统计分析，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民族主义行动的结构化，展示了正在转型的国家制度如何影响了民族运动的起落兴衰，以及如何组织挑战政治秩序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性条件努力在目标人群中唤起跨族群（ethnic groups）共鸣，结构性条件包括一个群体的民族联邦制，它的地域范围，语言使用情况以及城市化水平。不过，第三章还描述了，即使控制了这些因素，事件特定过程对行动的影响——尤其是递归效应和事件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一过程中产生在动员圈的范围之内，在精英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本章还提供了浪潮的一个潜在结构：早期的发起者试图充分享用结构便利的推动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以致其后的发起者依赖的是对先前成功事件的榜样作用和示范力量。

为将这一分析进行地更为深入，第四章通过调查探讨了认同政治，分析材料包括一系列深度个案研究，以及公开化期间分裂主义认同如何成功地在各群体内生根发芽。我力图超越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范式，在分析认同政治变迁时，并不在意认同是否为持续的情感联系或单纯的利益衍生物，而是关注结构和行动在相互关联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如何互动。我将展示的是，在民族主义浪潮的不同时段，结构便利的不规则分布如何改变了认同政治的特征，因为在面对制度约束的反动力时，这一分布形态决定了认同动员的成功可能性。初期的分裂主义先锋在强烈地受制于制度时，也得到了结构性条件的强大支持，因此行动受到勇气政治（politics of emboldening）的支配。然而，我将说明，当浪潮来袭时，事件的易感性过程很快成为认同政治的核心。以分裂为目标，结构条件不足的群体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对先前成功抗议事件加以利用，建构相似性，推动自身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挑战的榜样逐渐取代了结构便利，从而成为改变认同最重要的资源。举例来说，如果忽略浪潮性情境，乌克兰分裂认同的结晶化（crystallization）生成将是无法解释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苏联的终结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分裂主义的乌克兰扮演了关键角色。

第五章对 40 个群体的民族分离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运动中结构便利、制度约束与浪潮效应之间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民族运动的比例风险模型。分离主义运动的失败，在某些情境下是因为结构障碍的逐渐增加，这些障碍灌输给人们分离“不切实际”和“不可想象”等观念，即使没有明显的制度约束，也会迫使运动流产。但是，我也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或成功，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且结构便利和结构障碍都是动态变化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在大量的结构因素影响下，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对运动成败影响较大的是其他群体的行动。换言之，其他行动的成功能够为后续行动者提供一种顺水冲浪的能力。此外，有时群众的分裂运动失败了，而权贵精英对此加以利用，在一波波浪潮的影响下却能成功地实现分裂目标。

如上所述，任何完备的民族主义理论，不仅能解释民族主义意识的结晶化过程，还要能够阐释大众抗议行为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在第六章，我通过调查一项民族主义暴力运动的发起过程，来探讨公开化时期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是如何被交互过程形塑的。特别地，我还展示了在苏联民族主义抗议浪潮中出现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暴力，还描述了一些非暴力动员是如何转换为暴力动员的。常规化时期，政府禁止非国家暴力以及国家内部各部门、群体、地方之间的暴力，但是，在一个浓缩的历史时期，这种禁止在特殊情境下变得无效，大多数人认为暴力行动应该被允许，甚至是道德的。我们将看到，致使社会规范颠覆的特殊情境正是国家自身行为的结果。

第七章，我论证了国家强制力量在控制民族主义叛乱时的软弱无力，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防止分裂发生时，难以大规模地调动部署军队等国家强制力量，即使这一力量被调动了，也被



证明是无效的。我探索了苏联政府在公开化时期通过高压政治排斥民族主义歧见是如何失败的，以及我所指称的“压制政体”（regime of repression）——一套规则化的镇压实践，这套实践为大众带来了一种内化的预期：政府会采取惩罚性强力镇压挑战行动，然而这些在特定时期都是无效的。我认为制度化镇压的实践模式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强制力量在浪潮来袭时没能拯救苏维埃联盟，也阐释了为什么国家权威不能及时调动这一强力。我将论述，不只是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政权，包括他的保守派反对者都避免使用这一严酷力量来保护苏维埃联盟，主要是因为他们深深知晓制度应该如何被创造和继续。但是，我还是强调民族主义浪潮的力量如何通过削弱苏联维护政体的制度性保障，从而推翻了旧制度。

最后，在第八章我返回到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论题，追溯了“不可避免”意识如何在解体之前的一年半渐渐包围了苏联，尤其关注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浪潮对这一意识生成的影响。最后，苏联并非被某个个体或群体消灭，而正是被本应支持苏联继续的群体普遍的“不可避免”意识击溃的，面临无法镇压的民族叛乱、失败的改革都使苏联精疲力竭，最终可用的力量都未能拯救苏联。在四年“浓缩历史”和民族主义浪潮的突袭之后，曾经无法想象的变成可信的；不可思议变成了必然如此。

### 研究策略与研究依据

遵循经验研究的方法准则，本研究结合使用小样本和大样本研究，把前者嵌入后者之中，达到优势互补。任何一个研究策略都不能分离出既存结构条件、制度约束和事件特定过程的独立作用。如果不考虑三项因素之间的共时性，研究事件的内部独立因果关系就没有多少价值，就算控制了结构、制度等其他因素，事件还是受到更大的结构因素的影响。只有交替使用多种方法，我们才能解决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多元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事件跨越时空的模式与机制，以及每一事件对特定行动者的独特影响。

大样本分析，通过解析各种抗议形式随时间变化的起伏兴衰，以及跨群体效仿来确认结构在纵向时序与横向空间中的承续机制。在可行和恰当的时候，我会把横向空间时序分析和事件史分析两个模型结合起来，以便探讨事件的跨时空关系模式。可是，在分析行动的定量模式时，统计的内生性问题出现了，这一问题是由于某一行动的发生会影响另一未来行动发生的概率，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这一内生性，尤其是一个事件被先前事件影响的程度，确实是本研究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线性模型假定结构与行动之间是直接单向关系，所以就设想行动不会影响后续事件。相对而言，非线性事件的计数回归和事件史模型能够考察这些相继发生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而且，我们将发现，统计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事件对后续事件的系统性影响，尤其是递归和跨事件效应机制。

大样本研究策略的优点是，它们可以揭示大量行动发生的规律性模式，这在单一个案或事件的分析中是不易做到的。它们把某一事件或行动者集合放在更大的情境下，将其作为一个部分。但是，实在论者诟病的是，统计联系和共时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它们只是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因果关系假定，影响行动的机制是确定的，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所有效应能得到经验的证实。<sup>1</sup>我策略性地选择个案研究，以便追踪假定的因果关系效应下变化的结果。<sup>2</sup>总之，案例资料取自苏联 18 个加盟共和国的动员记录。这一定性研究不仅允许我们具体地检验结构的限制或促动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索特定事件的角色转换，跨事件联系，行动变成其自身因果结构中的一个要素的过程和机理，以及一个群体的行动影响其他群体行动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嵌入事件因果结构中的内生性不再是研究中加以排除的一个障碍，而是研究的一项核心内容。

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抗议事件。尽管事件史分析不是研究抗议的唯一方法，但它是学界

<sup>1</sup> David Little,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pp13-38.

<sup>2</sup> Andrew Bennett and Alexander Gorge, “An Alliance of Statistical and Case Study Methods: Research on the Interdemocratic Peace,” *APSA-CP*, vol.9, no.1 (Winter 1998), pp.6-9.





公认的探讨动员风波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确是一种追踪特定类型事件随时间起落兴衰的方法。附录 I 和附录 II 详细讲述了推演事件数据的方法，供读者参阅。在此处，我将对使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以及事件数据的科学性做一简短的讨论。

公开化期间是一个紧缩的暴风骤雨时期，革命叛乱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它就是我所定义的“浓缩历史”（thickened history）——在这一时期，事件超速升级且前后之间强烈地促动发展。报纸每天都会披露以前被隐匿的历史事实。每天都有许多，有时是数以百计的示威、罢工和大众暴力事件撼动着苏联。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制度变化让人眼花缭乱。正如一名社会运动激进分子后来对 1989 年情形的描述：“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密集的运动。”<sup>1</sup> 时间敏感性（time-sensitive）方法被用来解开这一压缩的历史，并将其放入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情境中。事件分析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高压时期，或在一个很少根据信念行事的环境下，很难从公共行为中辨识内在认同。在政治剧变时期，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就会不同，公共信念转换的如此之快以致于无法把握。这一环境下，公共民意测验只反映某一时点的情况。<sup>2</sup> 即使测验重复实施，测验专家也很难设计出收集巨变中的公共态度的系统性问题，因为曾藏于政治层面之下的主题在此时开始变得清晰，民意调查实践也受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之无序实践的影响。在前苏联的案例中，1987 到 1991 年之间，没有一项系统性测试是关于苏联公民对苏维埃政权是否应该存在的态度变化的。直到 1989 年 8 月，才有第一项全国范围内关于苏联人民对苏联政体分裂态度的调查。民意调查专家（西方和苏联）认为这一调查在当时是无法获得有效结果的，因为政治变迁过程就包含了态度的变化。我曾努力系统地搜集这一时期相关的调研信息（大部分都找到了），但是此类离散的、无序的民意记录只是那个时期的一些定格照片，不能全面反映革命情境中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

相对而言，事件分析是一种研究急剧变迁历史的有效方法。事件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动态性和时序性。它能帮助我们辨识特定形式集群行动所处的社会情境，并有助于我们确定此类行动的关键时刻以及起落兴衰变化的过程。尽管事件数据不能测量其中的观念因素，但它有助于我们洞察特定时刻群众的心理态度及其变化规律。确实，许多民族学者关注的理论议题都可被理解为动员的时序问题，群体动员的前后连贯性，过去发生的抗议风波与正在研究的抗议事件的关系，都是影响特定群体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

通过事件分析，我系统地收集了 1987 年 1 月至 1992 年 12 月以来 6663 项抗议示威和 2177 件群体暴力事件的资料，以此重构了那些致使苏联解体的动员风波。示威构成了当年大众挑战苏联多种形式中的一个层面。然而，这一时期最为普遍和显著的抗议形式，它们恰好反映了政府和挑战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此外，我收集了当时的罢工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与示威分析的结论相左。这一时期的大众暴力也是动员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在理解形塑民族主义暴力和非暴力表达的因素中是有价值的，并倾向于关注大量的新闻资源，有助于事件抽样分析的相对准确性。

本书所用信息并非公开化动员圈的一个完全同质的再现。但是，在附录 II 的明细中，从各种时间记录的数据检验中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精确的近似值，而且这确实远远超越了同类研究。尽管苏联解体是在 1991 年 8 月政变之后，但我却把研究扩展到 1992 年年底（政变后的十六个月）以避免右删节问题<sup>3</sup>，并以此研究解体对动员模式的影响。另外，我还收集了 1965 到 1986 年的 185 次示威和 50 件暴力事件，以便为公开化时期抗议动员的发展研究提供参照线，并探讨早期抗议模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事件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在它们被分析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我们可以按照特征、发生地、诉求类型、周、月或其他标准来进行分类整合。或者通过事件史分析把数据进行分解或检验。这一灵活性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sup>1</sup>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ovie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p.195.

<sup>2</sup> Sidney Tarrow, "Aiming at a Moving Target: 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cent Rebellions in Eastern Europ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March 1991), pp12-20.

<sup>3</sup> 【译注】右删节：统计技术事件史分析的基本概念，意为在观察期结束时事件尚未发生，时间缺乏完整性。

